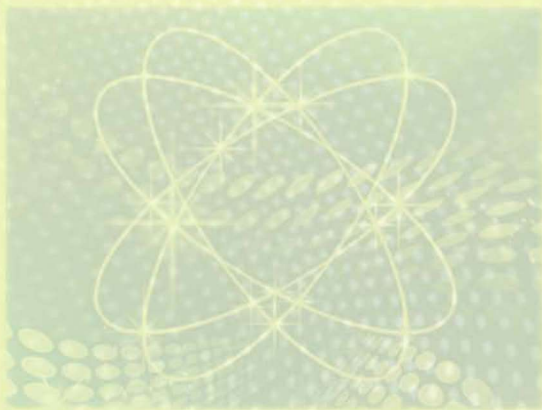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学名著
包法利夫人



译 序

古今中外，多少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，一经问世，即遭到无情的非难、攻击、批判，甚至查禁、焚毁，仅仅凭仗历史的公证，才最终获得其应有的地位，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，彪炳千古。居斯塔夫·福楼拜的传世之作《包法利夫人》的遭遇，就是典型的一例。

福楼拜动手写《包法利夫人》，是1851年9月19日在卢昂近郊的克罗瓦塞别墅。经过将近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，直到1856年5月才完稿。但誊写人誊写得一塌糊涂，福楼拜又不得不仔细校正，至5月31日，才寄给《巴黎杂志》他的朋友杜康。《巴黎杂志》是半月刊，将手稿搁置了三个月，才决定从10月1日至12月15日，分六期连载《包法利夫人》。但该刊审读委员会致函福楼拜，认为他的小说需要删节，请他把删节的全权交给编辑部。福楼拜未予理睬，仅在来函背面写了“荒谬透顶”四个字。从10月1日至11月15日发表的几部分，倒是未作删节。及至12月1日那一期准备付印之时，编辑部一位负责人对出租马车里发生的场面（即莱昂与爱玛从卢昂大教堂里出来后，乘出租马车疯跑全城那一段），忽然感到担心，说“这一段不合适，我们还是把它去掉吧。”福楼拜对此十分气愤，但为了不使编辑部为难，便说：“你们要删节，悉听尊便，但你们必须说明你们作了删节。”于是，编辑部加了一条脚注“审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删去此处的一段，因为它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。特此说明。”事情并未到此止步，接着12月15日那一期，编辑部又决定删去几处。福楼拜确实恼怒了，经交涉，在小说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议：“《巴黎杂志》出于我不赞同的某些考虑，在12月1日那一期里已删去了一段。在编辑这一期时，他们又顾虑重



重,认为必须删去好几处。因此,我声明对后面发表的部分不负责任,读者看到的仅是片断,不是整体。”

《包法利夫人》一发表,立刻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轰动。当时负责严密检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国检察署,看到这部轰动性小说在发表时《巴黎杂志》竟“顾虑重重”,多次删节,该刊审读委员会还特地声明,所删去的部分“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”。这还了得! 检察署高度警觉起来,对陆续发表的每一部分仔细研究,很快决定对这本书的作者福楼拜以及《巴黎杂志》发行经理洛朗·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起公诉。福楼拜等很快收到传票,审判于1857年1月31日开始。负责宣读公诉状的是代理检察长埃内斯特·皮纳尔。此人是帝国政府豢养的一条鹰犬,后来出任内政大臣。他在公诉状里,指控《包法利夫人》“败坏公众道德,诽谤宗教”。其重点打击对象是作者福楼拜。公诉状最后要求法庭从轻处理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,“至于主犯福楼拜,你们必须严惩”。这篇公诉状尽管十分蹩脚,许多地方十分可笑,但至今仍值得一读。它使我们看到,在资产阶级极权制度下,检察机关怎样不择手段,罗织罪名,扼杀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,达到钳制舆论,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。它是一个时代的回声,不仅说明了那个社会制度及其专制政权的反动,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偏见和狭隘。

出庭为福楼拜辩护的是儒勒·塞纳尔律师。他在辩护词中肯定《包法利夫人》是“一本好书”,“一本诚实的书”,“这本书的思想,从头至尾是一种非常合乎道德、合乎宗教的思想”,“它是通过揭露令人发指的道德败坏来弘扬道德”。塞纳尔是巴黎律师公会成员,曾任国民议会议长,可谓声誉卓著,而又雄辩机警。他的辩护词很有特色。当时,他如果不从肯定《包法利夫人》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这个前提入手,而从维护言论自由和维护艺术之于道德的独立性入手来进行辩护,那将是非常笨拙的。他不仅论证了《包法利夫人》是一本好书,而且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,强调它是作者长期深入、细致观察生活的结晶,赞扬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,甚至大胆肯定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。作为一个律师,在当时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。

就在开庭前夕,当时影响很大的诗人拉马丁,约见年轻的作者(福

楼拜那时年仅三十五岁),对他表示支持。福楼拜问他“先生,我因为写了这部作品,正受到轻罪法庭追究,指控我违背了道德和宗教,这一点你想得通吗?”拉马丁斩钉截铁地回答“亲爱的孩子,在法国没有一个法庭能给你定罪。有人如此误解你的作品,并下令对它提出起诉,这非常令人遗憾。不过,为了我们国家和我们时代的荣誉,任何法庭都不能给你定罪。”事实证明,拉马丁的断言是真知灼见。面对《包法利夫人》这部杰作,面对德高望重的塞纳尔律师逻辑严密、雄辩有力的辩护,面对许多著名作家的声援和抗争,巴黎第六轻罪法庭在“判决书”中虽然指出,“在本庭受到起诉的这部作品应该受到谴责”,但不得不承认,公诉状所指控的段落,“无论从它们所阐述的思想还是它们所描写的情景,仍属于作者试图塑造的人物性格的范畴”。因而宣告作者福楼拜以及《巴黎杂志》发行经理和印刷商“无罪”,“不予追究”。

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。它不仅是福楼拜的胜利,也是整个文学界的胜利。福楼拜本人充分意识到这个胜利的重大意义,他说“这场官司是整个当代文学的官司。人们攻击的不是我的小说,而是所有小说连同创作小说的权利。”^①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往往产生与其愿望相反的结果。这场官司不仅为《包法利夫人》做了广告,使它在两个月内销售量达一万五千册,此后又一版再版,而且进一步确立了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。

《包法利夫人》描写的,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因不满夫妻生活的平淡无奇而通奸,最后身败名裂,服毒自杀的故事。这样一个桃色事件,无论在实际生活中,还是在向来的爱情小说里,都是司空见惯的。何以经福楼拜写出来,便惊动了帝国政府检察署,立即对作者提出公诉,给他加上“败坏道德,诽谤宗教”的罪名,要求法庭“必须严惩”呢?这个问题的答案,只要分析一下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,便昭然若揭。

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,着眼点不在写她的爱情故事,而在写她从纯真到堕落,从堕落到毁灭的前因后果,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戕害人性,腐蚀人的灵魂,甚至吞噬人的罪恶本质。

^① 福楼拜《书信集》第Ⅱ卷第677页。



爱玛出生于外省一个殷实农家。和许多乡下女孩子一样，她聪明伶俐，天真纯朴。可是，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，无论巴黎还是外省的中上层资产阶级，都把女孩子送进修道院接受一段教育，培养贵族式的思想感情和言行举止，为日后进入上流社会打下基础。爱玛的父亲鲁俄老爹爱女心切，也赶时髦，把她送进卢昂的修道院。爱玛生性敏感，感情热烈，想象丰富，在修道院里，“修女们在训诫时，反复拿未婚夫、丈夫、天国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这些概念进行比较，在她的灵魂深处，唤起意想不到的柔情”，而宗教音乐课上所唱的抒情歌曲，全都“格调低下，音调轻浮，使爱玛窥见了诱人而又变化莫测的感情世界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修道院禁欲主义的说教，只能起反作用，越发刺激她受压抑的情感和对爱情的遐想。不仅如此，1830年前后风靡人心的消极浪漫主义，配合天主教卷土重来的活动，也渗透进了修道院。正是在修道院里，爱玛接受了浪漫主义传奇小说的熏陶，成天满脑子情男、情女、眼泪与吻、月下小舟、林中夜莺、凭窗盼望白翎骑士前来幽会的女城堡主。这些东西与她出身的环境和她日后的家庭生活，格格不入。正是社会提倡的修道院教育，腐蚀了爱玛稚嫩的心灵，在她灵魂深处播下了淫靡的种子，做成了堕落的温床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这种教育，日后的爱玛及其生活道路，必然会是另外一种样子。由修道院陶铸出来的爱玛·鲁俄小姐，怀着对爱情的憧憬结了婚，成了包法利夫人。包法利是乡镇医生，按理说在乡间算得上一个体面人物，可是他平庸无能，感情迟钝，与爱玛幻想中的骑士相差十万八千里。爱玛所期待的爱情没有到来。而沃比萨尔的舞会却向她展示了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生活。在这里，她体验到了奢侈豪华的生活的滋味，看到了养尊处优、浪荡调情的贵夫人，看到了曾经在王宫里很吃香、在王后娘娘床上睡过觉的老公爵，还同那位风度翩翩、颇有骑士派头的子爵跳过舞。这次舞会是涉足社交生活的爱玛所上的第一课，使她在修道院时期所产生的天花乱坠的幻想，变成了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生活方式，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后来她的一切渴求和梦想的背后，都浮现出这次舞会的难忘情景。包法利夫人本来并不是个坏女人，尽管受了这些教育和影响，在迁居永维镇之后，她还是

一度发狠躲避莱昂的追求，力图当一个贤妻良母，甚至试图帮助丈夫在事业上创造惊人的成就，名扬天下。但是丈夫太无能，太不争气，险些断送一条人命，使她受到不堪承受的打击，觉得包法利这个姓氏给她带来的只有屈辱，因此本已岌岌可危的贞操，才彻底崩溃了。她也曾一度试图到宗教中去寻求抵御情欲诱惑的力量，可是自称“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”的本堂神甫，对她心灵苦闷的倾吐却无动于衷，根本不理解，使她的希望归于彻底幻灭。社会给她造成了堕落的温床，而在她本能地一再反抗、挣扎时，在社会上却找不到任何救助。而罗多尔夫、莱昂这类道德败坏、专门玩弄女性的男人，却一再勾引她。这样，她便不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虏获物，最终堕落在不可救药的淫妇。显然，包法利夫人之所以陷入堕落的泥坑，祸根不是别的，正是资产阶级的教育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腐蚀和引诱。我们可以说，是那个堕落的社会造成了包法利夫人的堕落。

包法利夫人的致命错误，在于她不懂得豪华淫逸的生活和浪漫传奇的爱情，需要物质财富作为基础。她的家庭环境，无论她父亲还是她丈夫的家境，都不具备这种物质条件，而她却偏偏要去追求那种不可能属于她的生活。在她寻求爱情和幸福，却沦为别人的玩物的过程中，她不知不觉地将丈夫的薄产挥霍殆尽。这便给高利贷者提供了可乘之机。唯利是图、精明狡猾的奸商勒乐，看准了包法利夫人的弱点和处境，拿物欲作为诱饵，让她签署一张又一张借据，使她积债如山，而一旦发现她身上再也没有油水可榨时，便串通法院，扣押包法利家的财产抵债，并且张贴布告宣布拍卖。包法利夫人被逼到了家庭破产、身败名裂的绝境。她求助于情人，情人们推诿搪塞；她求助于税吏，税吏无动于衷；她求助于公证人，公证人花言巧语，企图乘其危难占有她。这时的人世，对包法利夫人是那样冷酷无情！在她面前只剩下一条路，就是结束她尚年轻的生命。事实再清楚不过：包法利夫人是被资产阶级社会逼死的——除了这个结论，人们还能得出什么别的结论呢？作品所描写的包法利夫人这个悲剧人物是一个典型，是被资产阶级社会摧残的千千万万妇女的代表。作者本人就说过：“就在此



刻,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,正在法国的十二个村庄里受罪、哭泣!”^①被逼致死的包法利夫人遭到社会唾弃,而引诱她堕落的情人罗多尔夫和莱昂,却逍遥自在,甚至步步高升。作品结尾的这一笔,更包含了辛辣的讽刺和血泪的控诉。福楼拜说“任何写照都是讽刺,历史是控诉。”^②这种讽刺和控诉,构成了《包法利夫人》强烈的批判效果。

《包法利夫人》强烈的批判效果,不仅仅体现在对爱玛的命运的描述上。这部小说有个副标题,叫做《外省风俗》。除了爱玛的生活经历之外,它还给人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外省风俗画呢?给人以鲜明印象的,首先是一幅形形色色的外省资产者群丑图。这里有满嘴“进步”、“科学”,实际上不学无术,却怀着政治野心,欺世盗名的药店老板奥梅;有自誉为“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”,实际上对人的感情一窍不通,浅薄可笑的本堂神甫布尔尼贤;有道貌岸然,彬彬有礼,却满肚子男盗女娼,与奸商暗中勾结,饱肥私囊的公证人纪尧曼;有唯利是图,奸诈狡猾,重利盘剥,置人于死地的奸商兼高利贷者勒乐;有灵魂肮脏,腐化堕落,随心所欲玩弄女性,纵情声色犬马的地主罗多尔夫;还有生活空虚,百无聊赖,整天摆弄旋床以消磨时光的税吏兼消防队长比内,如此等等。当然。乡镇医生包法利也应算其中一个,这是一个思想平庸,能力低下,感情迟钝,麻木不仁,做过“名扬天下”的美梦,但终因医术平常,只好安于现状的人。够了,在一个外省乡镇,数得着的有头有脸的人物,基本上齐全了;要说缺,只缺一个乡村教师,因为那个时代在乡间,教师还不受人重视。作者把整个乡镇的头面人物,写得如此周全,几乎一个不漏,不能不说是一种着意安排。这些人算得上乡镇的精英吧,可是他们之中,竟然没有一个坦荡君子,没有一个德才兼备之士,没有一个有德性的角色!他们全都是蝇营狗苟之辈!一个乡镇是如此,推而广之,整个资产阶级,整个社会,不是可想而知了吗?这就是为什么《包法利夫人》虽然写的是外省一隅,却具有震动整个统治阶级力量的原因。

① 福楼拜:1853年3月14日给科莱夫人的信。

② 福楼拜:1857年2月给普拉迪埃的信。

作为外省风俗画，作品中以浓重的色彩，渲染的笔调，描写了一个“农业评比会”。这是当局宣扬成就、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一次盛会。会场上张灯结彩，敲锣打鼓，鸣枪放炮，一派在永维镇难得见到的节日景象。就在这非凡的热闹气氛中，各种头面人物，上至省府参事，下至本地乡绅，粉墨登场。其中，药店老板奥梅，上蹿下跳，出尽风头；教堂执事赖斯迪布都瓦，趁机向参加会议的农民出租教堂的椅子，大捞外快；省府参事在主席台上发表演说，大肆吹嘘全国农村的进步和政府对农民的关心，而罗多尔夫钻到二楼，甜言蜜语勾引包法利夫人，两个人一个慷慨激昂，一个窃窃私语，形成了一曲令人忍俊不禁的二重唱；而主席台下的整个会场，人群吵吵嚷嚷，牛哞羊咩，乱成一片。一个庄严隆重的评比会，变成了一幕滑稽可笑的闹剧。不仅如此，在大会主席宣布的长长一串获奖者名单中，有一位给地主干了五十四年活的老太太，人又老又瘦，脸上的皱纹比风干的苹果还多，身上穿着破衣服，两只手长年接触谷仓的尘土、洗濯的碱水和羊毛的油脂，粗糙发硬，疙里疙瘩，合也合不拢，而她半个多世纪的辛劳所换来的奖赏，只不过是一枚仅值二十五法郎的奖章！作品中精心安排这样一位被剥削制度压榨干的农妇，作为获奖者的代表，不正是对省府参事所唱的高调，对这次所谓评比会的抗议吗？会议结束后，头面人物全都留下来大吃大喝，而群众散去，“人人回到原来的地位，主子继续虐待雇工，雇工继续用鞭子抽打牲口”。这是多么尖刻的讽刺，多么有力的批判。而这种讽刺和批判所针对的，从作品中不难看出，是政府，是最高当局，甚至国君。

《包法利夫人》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七月王朝，但它所揭露和批判的，主要是第二帝国的社会现实。难怪作品一问世，就立刻掀起轩然大波，“遭到政府攻击，报纸谩骂，教士仇视”，帝国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拿作者问罪。这正是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，正是这部作品继《红与黑》和《人间喜剧》之后，成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又一部杰作的根本原因。

作为继《红与黑》和《人间喜剧》之后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又一部杰作，《包法利夫人》不仅思想内涵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批判



效果,而且艺术风格上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,取得了革新性的突破,在法国甚至世界文坛,获得了普遍赞誉和高度评价。拉马丁说这部作品是他“二十年来读到的最优秀的作品”^①;波德莱尔赞扬福楼拜“肩负了开辟一条新路的使命”^②;圣勃夫评论说“在许多地方,我觉得从不同形式下看到了新文学的标志。”^③左拉宣称“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”^④;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认为“完美无缺的《包法利夫人》问世后,在文坛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。”^⑤这些评价不约而同地高度肯定了《包法利夫人》的艺术成就。

福楼拜把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当作小说创作的最高原则。他像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一样,把小说喻为“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”^⑥。他认为真实和美是不可分割的“美就意味着真实。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,但美的东西,永远是真实的。”“丧失了真实性,也就丧失了艺术性。”^⑦这些论断反映了福楼拜的艺术风格的基本倾向。但这种基本倾向并非福楼拜所独具。人们同样可以拿这些观点,去衡量和评价其他现实主义大师们的艺术特点。福楼拜的独创,在于他通过《包法利夫人》,把小说艺术的真实原则推到了“纯客观”的境界。他主张,作家写小说,应该像自然科学家搞科学研究那样,始终保持客观、冷静、冷静的态度,“作者的想象,即使让读者模糊地猜测到,也是不允许的”。作品中“一页一行,一句一字,都不应该流露出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的丝毫痕迹”^⑧。《包法利夫人》以前的小说,无论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,还是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,在作品中作者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,由作者叙述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,评价人物和事件;作者还经常借题发挥,抒发感慨或阐发哲理,甚至向读者进行说教。总之,作者无所

① 拉马丁:1857年1月30日约见福楼拜的谈话。

② 《波德莱尔全集》第Ⅲ卷第523页。

③ 圣勃夫《包法利夫人》,1857年5月4日《世界箴言报》。

④ 左拉《居斯塔夫·福楼拜》。

⑤ 爱琳娜·马克思《包法利夫人》英译本导言。

⑥ 莫泊桑《居斯塔夫·福楼拜》。

⑦ 同上。

⑧ 同上。

不在,无所不能。在《包法利夫人》里,这一切都不见了。作者把自己深深地隐藏了起来。读完这部小说,甚至很难弄清故事的叙述者究竟是谁?作品上卷第一章写上中学的夏尔·包法利,其中有一句话“夏尔当时的情形,现在我们恐怕谁也不记得很清楚了。”由此看,故事的叙述者似乎是夏尔的一位同学。但仅此而已,后面再也没露出蛛丝马迹。写爱玛的遭遇和命运,作者自始至终没有出面发一句感慨;写“农业评比会”那样的场面,作者也没有出面发一句议论。总之,作者把自己彻底从作品中排除了。他只是通过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,把现实生活忠实地描写出来,一切让读者去体会,让读者去下结论。这种“纯客观”小说,根植于前期批判现实主义的土壤之中,而为19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。左拉就特别推崇《包法利夫人》,称之为“自然主义的典范之作”,并且通过对《包法利夫人》的评价,阐述了自然主义的艺术观:“小说家无动于衷是一条基本法则。自然主义小说家使自己彻底消失在自己所叙述的行动背后。他是藏而不露的戏剧导演。”“作家不是说教者,而是解剖学家。他只满足于讲出在人的尸体里所看到的东西,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。小说家始终保持不偏不倚。福楼拜就是这样写小说的。”^①

前面已经提到,《包法利夫人》以前的小说,作品中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、主要人物的出身,甚至重要活动或习俗的来龙去脉,无不详详细细交代得一清二楚,力图让读者感到,一切都有根有据,天衣无缝。可是,读完《包法利夫人》,读者会发现,这本小说根本没有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交代,人物出身也没有专门的交代,更没有家族谱系式的回顾与叙述。作品的着眼点,是描写现实的生活,描写人物现实的活动、遭遇和命运。至于这一切的背景,则是一片虚无。这样做的目的,是尽可能地把作品的主题思想隐藏起来,让读者自己去思考、体会、理解。关于这一点,作者福楼拜说得很明确“我觉得美的,亦即我想写的,是一本建立在虚无之上的书。它仅仅靠自己,靠其文笔的内在力量来维持,就像地球没有任何支撑而维持在空中一样。

^① 左拉《自然主义小说》。



这是一本没有主题，或者尽可能让主题隐而不露的书。”^①这种“建立在虚无之上”的小说，正是《包法利夫人》整体风格的又一重要特点。

与虚无相联系的，是《包法利夫人》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“荒诞”的特色。由于作品所着眼的是“直接描写”，写人物活动不言明其动机，写物件不暗示其象征意义，这就难免让人捉摸不透而产生荒诞之感。当然，这种情况仅仅是局部的，尚不构成这部作品的整体特色。关于这一点，后世评论家作为典型进行分析的，主要是两个例子：其一是包法利夫人为了与莱昂幽会，频繁地奔走于永维镇与卢昂之间。她的行动完全出于一种本能，不顾一切后果，令人感到极不近情理而显得荒诞。其二是关于夏尔上中学时所戴的帽子的描写。这是尤为典型的一个例子。读者不妨再来玩味一下这段描写：“他那顶帽子可是颇有特色，既像熊皮帽、骑兵盔，又像圆筒帽、水獭皮鸭舌帽和棉布睡帽，总之不三不四，十分寒碜，它那不声不响的难看样子，活像一个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。它呈椭圆形，里面用鲸鱼骨支撑；帽口有三道环状滚边，往上是由丝绒和兔子皮镶成的菱形方块，彼此交错，中间有红道隔开；再往上，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帽顶；帽顶蒙着一块图案复杂的彩绣，中间垂下一根过分细的长带子，末梢吊着一个结成十字形花纹的金线坠子。那顶帽子倒是崭新的，帽檐闪闪发光。”请看，这顶帽子描写得不可谓不生动，不可谓不具体。但是，它的总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呢？读者恐怕很难讲得清楚，甚至它作为帽子的基本特征，也消失在读者的意识的空白之中。至于它究竟具有什么象征意义，就更难把握，似乎它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存在，甚至就在于它本来不代表任何意义。这种荒诞的描写，给了后世的现代派小说家生动的启示。

福楼拜是位语言大师，很注重人物性格化的语言。但是在《包法利夫人》里，他对人物对话的描写显得相当节制，作品里几乎见不到大段大段的直接对话。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是突出地运用了人物内心独白。不仅爱玛和夏尔，就是罗多尔夫和莱昂，甚至鲁俄老爹，都有

^① 福楼拜《书信集》第Ⅱ卷第31页。

大段的内心独白。虽然从整体上讲,内心独白在这部作品中也是局部的,但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“包法利特色”。内心独白正是人物心理上那个最隐秘的领域、那个梦呓般难以表达的领域的流露,是人物的思想在无意识层次的流动,有助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,使人物的思想、感情和性格更加丰富,更加充实,更具有立体感,更真实可信。

福楼拜是一位锐意创新的艺术家,他在《包法利夫人》里为追求艺术的完美所作的尝试,为革新小说的艺术形式作出了重要贡献,引起了20世纪的现代派小说家们的普遍注意,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意识流小说大师普鲁斯特认为,《包法利夫人》中人物内心独白和动词非确指过去时的运用,使得福楼拜“几乎像康德一样更新了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,更新了认识及外部世界现实的理论”^①。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称福楼拜是“现代小说的创始人”,“处于当今所有文学问题的会合处”。^②而60年代“新小说”的主要作家罗伯·格里耶和娜塔丽·萨洛特,在猛烈抨击巴尔扎克式小说的同时,却把福楼拜奉为前驱,全面继承并大大发展了《包法利夫人》革新性的艺术特色,进而把小说的艺术形式推到了极端。现代派小说家们对福楼拜的崇奉和继承,充分显示了福楼拜在法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,而一百多年来人们对《包法利夫人》的研究、评价和借鉴,说明这部作品成了现代小说名副其实的古典。法国当代小说家兼评论家蒙泰朗说得好:“法国当代所有作家,至少像我这种年龄的作家,都从他(福楼拜)那里得到了一些什么。”“人们感激他塑造了一个典型——包法利夫人的典型。”^③

罗国林

2010年7月

① 普鲁斯特:《论福楼拜的风格》,1919年3月《新法兰西杂志》。

② 萨特《家庭的傻子》第Ⅱ卷第8页。

③ 《包法利夫人》1983年版序言。

主要人物表

- 爱玛 庄园主鲁俄的女儿，美丽单纯，自幼受过修道院教育，向往浪漫的爱情生活。嫁给夏尔·包法利医生后，感受不到生活的欢乐，与人私通，但一再被欺骗，债台高筑，于绝望中自杀。
- 夏尔 即包法利医生，老实本分，感情迟钝。爱玛自杀后，他为清偿债务变卖了全部家产，最终在忧郁中离开了人世。
- 鲁俄老爹 爱玛的父亲，心地善良，但爱慕虚荣，喜欢考究的生活。他很疼爱爱玛，在爱玛很小的时候就把她送到修道院里读书，把日后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。
- 罗多尔夫 有钱的庄园主，风月场上的老手，用花言巧语俘获了爱玛的心，使爱玛一再委身于他。在厌倦了爱玛的身体后，便无情地抛弃爱玛另寻新欢，是将爱玛推上绝路的罪魁祸首之一。
- 莱昂 法律系大学生，外表斯文风雅，内心懦弱虚伪。他与爱玛私通，弄得爱玛身败名裂、债台高筑，是将爱玛推上绝路的罪魁祸首之一。
- 勒乐 高利贷商人，唯利是图，狡狴阴险，他利用爱玛的享乐心理放债给爱玛，以获取高额利润，最后上门逼债，弄得爱玛家破人亡，是将爱玛推上绝路的罪魁祸首之一。

包法利夫人

外省风俗



包法利夫人

献 给

路易·布耶

C 目 录 CONTENTS

译序 / 1

主要人物表 / 1

外省风俗 / 1

上卷 / 1

中卷 / 57

下卷 / 199

附: 审判记录 / 310

作者年表 / 348

包法利夫人

上 卷

